

从剑桥大学收藏的刘丽川告示 论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关系

王庆成

1984年5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未编号资料箱发现“太平天国招讨大元帅”刘丽川为“正风俗去邪教”、“知人踪迹根源”告示两件，都署甲寅四年(1854)四月发。这两篇文件当月译载于上海《北华捷报》(1854年5月20日199期)，1959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回译为中文刊出。今见原件，可以订正英译或回译中一些欠准确的文句。“知人踪迹根源”告示中刘丽川自署衔名的译文是“大明(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而原文则称“太平天国招讨大元帅”。凡此，都更有利于研究利用。现照式抄录于下(原无标点)，酌加说明；本文重点则是从这两篇文件与太平天国思想之异同，讨论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太平天国招讨大元帅刘

为

晚谕正风俗去邪教而知君亲事：照得我中国三代尧舜以来，未有佛教。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民间快乐，五谷丰登。佛教由汉明帝时其法始入中国。后之宗其教者，遂以释迦之本性为法身，德业为报身，并其真身而为三，其实一身耳。唐儒韩愈曰：三代之时百姓安乐寿考，中国未有佛也。自汉有佛法以来，羌戎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乱亡相继；宋齐梁陈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梁武舍身施佛，饿死台城。曰(由)此观之，佛不足事明矣。至于道家以老子为师，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乙道

君又非老子之报身，设有二像，又非与老子为一，而老子又自
为上清太上道君，盖仿释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老聃亦人鬼耳，
岂可僭居昊天

上帝乏(之)上乎？如宋徽宗躬身亲祠醮，倾心崇奉，卒之陷身虏
廷，复亡宗社，可为明戒。佛老之徒，妄相称述，惑世诬民，莫此为
甚。伏望自今以始，凡世间有识见人，自然不崇邪信佛。今天下愚
夫愚妇，谁不受其惑溺？即有读吾儒之书者，犹然不悟，总归于愚
而已矣。然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言，恣其假托。使不忠不
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税。伪起三涂，谬张六
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且生死寿夭，由于天
命；刑德威福，关人之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
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夫！今(今)天下
僧尼数盈十万，请令匹配，即成十余万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
纪教训，可以耕种。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况浮食者众乎！兹人由
天地造化，父母所生。怀胎十个月，受尽千辛万苦。临产之时，母命
未能保全，产子出来，抚养三年，婴儿不能言议(语)，哭啼之声，父
母不晓作甚。屎尿随身，冷则加衣，啼则与食，倘不遂意，父母日夜
无眠。养至会言会走，又要请师教读，养育成人，又教与手艺，士农
工商，随各所好。又与娶亲，父母方能安心。父母费尽千般辛苦万
般心事待子，岂可为人子女者，父母在，生不孝顺，报养育之恩，父
母死后，听妖僧妖道做功课打斋醮去招生佛地，此大不孝之事也。
父母生前不孝敬，死后何用作功德？有等愚人到寺院焚香烧锭，与
佛像镶金，何不将此钱银买物孝敬父母？堂前两尊活佛，父母不奉
待，反去奉待上(土)木偶象，费无益之钱银。圣人云，万盖(善)以
孝弟先头。今我洪门兄弟，务宜忠心报国，为人子者必孝双亲。为
臣者不忠于君，为子者不孝双亲，天必不佑也。从今出示，望尔
等被邪教迷惑之愚人及早醒悟。去邪教，为正风俗，勿拜无益土木
偶像，勿到寺院焚香烧锭，省无益之银钱，以养妻活儿，孝敬双亲。
本帅并非别故，是照依

明朝故国规制而行之，以全忠孝，省无益之费耳。祈为凜遵毋违。
特示。

甲寅四年四月

日示

晓谕知人之踪迹根源事：盖

天父上帝创造天地日月星辰花果草木禽兽，乃开辟之始，未有人也。上帝抟土为人，嘘气入鼻而成血气之人，造成一男一女后，乃令其男酣睡，取其一肋骨，弥缝其肉，以所取之肋骨成女，以便生育。今其人取树上所生之果实可适口，是未有五谷也。抟土为人，现有数端凭据。兹小孩童玩耍，无人教他，他自己会取土作成成人形玩耍，是凭据一也。人之身上出汗必有泥，此泥从河而来？乃人是土作成，故此有泥，是凭据二也。其女人自幼时如孩童一样，到发身时胸前多两乳之肉，数之其肋骨，以男人另多一骨，此又是凭据。现有凭有据为证之事可信乎？其真实也。经书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此之谓也。况尔等各人俱有孝敬双亲敬奉宗祖之心，为何舍去开辟天地创造万物始造人一天父上帝而不奉敬，反去信邪神崇拜土木偶像？况人由

上帝创造出来，就是各人之始祖，为何不信敬，还去敬奉什么神佛哉？

上帝以六日完成天地人万物，至第七日事毕憩息，故以第七日礼拜，各守安息，不作生活，是守上帝安息圣日也。尔等军民士庶，各宜回心，想透真假，及早醒悟，尊敬天父上帝，莫被妖僧邪道迷惑不醒。况我中国三代时，俱奉敬上帝，及有创造天地万物一书，被洪水横流氾滥于天下，后又遭秦始皇焚书坑儒，其书尽没，故此无存。西域妖僧矫诈，乘此时入我中国，迷惑人心。况我明太祖洪武皇帝也，曾将各邪神废去祭祀，革去敕封衔号，此事有康济谱一书为证，是未毁寺院，故未除根也。到洪妖僧道复兴，未得其人点醒迷途，以至各人不知来踪，未晓三才是由上帝所造，皆被妖僧迷惑，俱云由佛。佛乃由周朝战国而起，汉明帝时其法始入中国。天地造化，与佛无干，为何尔等痴迷不醒，信他糊言惑众哉！况刑德祸福，皆由上帝主裁。上帝无所不在，万事俱晓，不能瞒骗分毫。尔等各人务宜尊心崇奉上帝，毋庸焚香烧锭，乃各人心敬，早晚祈求上帝点醒迷途，庇佑安康，守安息圣日而已。非比邪神要受私，要到庙堂许愿，方肯庇佑，怪饮怪食，宰牛羊牲仪，到庙堂还愿，方能平安。问一吉凶

之事，又要烧几串银锭，岂非受私之邪神怪，以贪官污吏何异哉！尔等各人幸有人点醒迷途，去邪归正。有志者及早回头，乃万幸之幸也。特此示知，毋得狐疑。特示。

甲寅四年四月

日示

上海小刀会起义领袖刘丽川发布的这两件告示，“太平天国招讨大元帅刘 为”一行，系大字刻版墨印，此外全文均手写墨书，未钤印。据《北华捷报》译载时报道，“正风俗去邪教”一篇发布于5月11日，“知人踪迹根源”一篇系5月17日“叛党在城内各处张贴”¹¹。5月11日、17日分别为阴历四月十五日、二十一日。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这两件告示都是手写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编入另两件“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左元帅”陈阿林的告示，也都是手写的。各处张贴手写告示，可能是由于起义当局印刷之困难。剑桥的这两件都没有粘贴的痕迹，应是写好后未张贴之件，送给英国人或为英国人所得而携回英国的。

天地会是清朝最著名的秘密结社组织，而小刀会、三合会都是它的支派和改称。它们宗教色彩淡薄，在武装起义中常有反清复明的口号。上海小刀会起义军首领刘丽川是广东人，1845年在香港加入三合会，1849年到上海组织小刀会。他所发布的以上两件告示，指斥佛、道为邪教，以天父上帝为创造天地人万物之主，要求人人崇拜上帝，这是其它任何天地会系统的文件所未有的，显然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表示着它们在思想信仰上对太平天国的靠近。

这两篇告示以“天父上帝创造天地日月星辰花果草木禽兽”并为人类始祖，以“中国三代时俱敬奉上帝”、“中国三代尧舜以来未有佛教”，故其时“君明臣忠，祚年长久，民间快乐，五谷丰登”。这与太平天国的《天条书》、《原道觉世训》等诏书称皇上帝造天造地造飞潜动植物及造人化人，称中国自盘古至三代君民共敬上帝，其

11.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23、25页编者注。

时为门不闭户、道不拾遗之大同世界，旨意相同，文字相近。论这种局面的败坏，由于汉明帝时传入佛法，因之祸乱相继，及所举事例，也都见于《原道觉世训》。“凭据”二字为古词语，近世中国基督徒和太平天国习用，而“知人踪迹根源”告示用“凭据”一词五次，似乎也是太平天国的影响。

上述告示表现出小刀会起义领袖受太平天国思想、信仰之影响，对此，有以为是由于这一年洪仁玕到过上海的缘故。这没有根据。据洪仁玕自述，1854年到上海后，“洋人不肯送予进南京，其上海城内红兵（按指小刀会起义军）不信予为天王之弟，乃在夷馆学习天文历数”^①。刘丽川从他那里受到影响是极不可能的。从1853年4月以后，英、法、美三国公使和传教士屡次从上海访问南京、镇江，得到太平天国赠书，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军间还可能有密使往来，刘丽川有很多机会得到、见到太平天国的书籍。此外，刘丽川告示关于人类始祖系上帝抔土为人、女性是男性肋骨造成的说法，未见于太平天国文献，系直接据自旧约圣经创世传。所以，刘丽川告示的思想资料来源有广泛的渠道，根本无须洪仁玕的到来。

刘丽川的告示与太平天国的思想信仰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刘丽川对佛、道的批判是世俗性的，告示论人之不应拜佛烧香，重点在应该孝敬父母，而不强调应该崇拜“天下凡间大共之天父”。它更没有肯定上帝、基督降凡和天王下凡作主这些太平天国的基本政治宗教信条。尤其是，告示称“我明太祖洪武皇帝曾将各邪神废去祭祀”，称“正风俗去邪教而敬君亲”是依照“明朝故国规制”、要求“洪门兄弟”遵行，更显示了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主张上与太平天国仍有很大的距离。

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久有不同的见解。有学者根据刘丽川上述两篇告示的回译文以及其它记载，认为上海义军“接受了太平天国信仰”，认为“太平天国领导了上海小刀会

①：《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第2册，845页。

起义军”、“太平天国接受了上海小刀会的加入”^①。刘丽川的两篇告示,显示了与太平天国宗教、政治观念的一致和差异。因此,联系这两篇文献,谨本争鸣之义,对双方的关系问题贡献一得之愚,略作讨论。

关于太平天国与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关系,客观地看,应该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起义者对太平天国的态度。这比较明确,起义者首领,尤其是刘丽川热烈要求太平天国给予领导和支援。1853年9月7日起义当天及稍后,刘丽川等称“大明国”大元帅、招讨大元帅等,布告称“鞑夷当灭,明当复兴”。但约当9月20日左右,刘丽川上奏太平天国天王,自称“未受职臣”,报告已“立定上海”,“分定嘉定、宝山、川沙、南汇等府县地方”,“乞我主上早命差官莅任,暨颁赐眷黄,以顺天心,以慰民望”。奏章末署“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八月”,使用了太平天国的国号年号^②。此后,起义首领刘丽川等的告示,凡署衔者,刘丽川都称“太平天国招讨大元帅”、“太平天国统理政教大元帅”;其副元帅陈阿林或称“太平天国”或仍称“大明国”^③。1853年正当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命将北伐西征,处在向上发展时期,具有很大的吸附力,所以刘丽川上奏颂为“定鼎金陵,民安国泰,四海归心,应天顺人”,“不啻武王兴周”。时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即1847年曾在广州为洪秀全的宗教老师者,于9月25日往见刘丽川,刘对他说:“已送了两封公文往南京,与太平王通款曲;其一由陆路,其一由水路递送,正等候复音,并盼望南京派大员前来与其布置上海各事。”^④所述与上述奏章一致。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1991)第4册,2455—2458页。

② 刘丽川上天王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0册,460—461页。

③ 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一部份:《小刀会起义文献》。

④ 罗孝全著、简又文译:《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访问记》,见《太平天国》第6册,967页。

但这一封由水陆两路分送的奏章,可能都未送达南京。由水路递送的一件,系托一军火商人的轮船带去,在镇江江面为清军水师截获^①。陆路递送一件是否送到,并无记载。有学者认为已被南京收到,并想象洪秀全立即下诏嘉奖,嘉奖诏到上海,万众欢腾^②。关于刘丽川从陆路递送的称臣奏章曾否送达南京,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一书记东王杨秀清给上海起义者的信,颇有助于分析这一问题:

股匪罗大纲,为冬官正丞相,盘据镇江,……当上海另有别匪滋事之时未久,罗贼即有禀至省中(按指南京)杨逆处云:探得上海另有一般人在彼已得城池,此一般人约三四千人在彼云云,……随后伪东王杨逆忽发出伪檄一函,曾有人密为私拆,其略云:“盖闻识时务者为英雄,知进退者为俊杰。观当今之大局,知真主为天王。三月间曾据钦差大臣罗大纲弟来禀,知弟等请攻苏常,弟等在上海愿为内应,本军师不胜欣慰,何以迁延至今?如果率众来归,必当奏请封加显爵。何去何从?希自谅之”云云。……檄外书“右札尚海李闻风弟等开拆”字样。此伪檄系交付罗逆处,后不知罗逆处如何回复,伪檄是否私递上海,均不得悉。^③

太平军克南京后,“涤浮道人”居城内一年多,亲历目睹汇为《金陵杂记》一书,富有史料价值,所以上述这段记载和其中引述的杨秀清此信久为学者所重视和利用^④。

杨秀清信中提到,三月间得知上海义军请攻苏常、询问何以迁延至今,据此,此信至早应写于甲寅四年四月^⑤。可见直到那时,南京并不知道刘丽川早已上奏称臣之事;不然,杨秀清信中不可能提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怡良等奏称捕获宁波钓船,搜获英国商人喇呐吐致镇江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书一件”,并洋枪刀若干(奏到日为1853年12月20日),见卷六,233页。夏燮《中西纪事》记带信人是“上海领事温哪治”。

② 《太平天国史》第4册,2423页。

③ 见《太平天国》第4册,625—626页。

④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1962)上册引用。又罗尔纲早年著作也都引用。

⑤ 简又文系杨秀清函于癸丑(1853年)。但那是不可可能的。罗大纲探知上海一般人“已得城池”,必应在起事以后。故“三月”只能是甲寅(1854)三月。

出“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是刘丽川从陆路送去的称臣表并未被南京收到的证据之一。所谓的天王下诏嘉奖，义军万从欢腾，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从杨秀清信来看，刘丽川奏虽未送达南京，但上海义军与镇江罗大纲之间似已早通消息；李闻风或许就是与罗大纲通消息者。李闻风可能是小刀会中人，但并非著名领袖。

杨秀清此信表示了欢迎“率众来归”。在杨秀清给李闻风写信后不久，1854年6月，英国领事麦华陀等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提询若干问题，其中有“占领上海的闽广党是否仍归顺你们，你们是否接受其归顺”一问。对此，杨秀清回答：“不单准上海闽广党投降，天下万国皆要来降也。”^①这是太平天国公开表明接受上海义军的归顺。

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向太平天国递送过称臣表，太平天国也曾有接受归顺的表示。但是，双方是否已在事实上建立了关系？太平天国是否领导、支援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军？那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当时，起义军孤立于上海，与南京、镇江俱隔数百里之遥。太平天国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采取过什么措施去帮助实现义军的归顺？看来没有。

南京虽未收到刘丽川的奏表，但上述滌浮道人的《金陵杂记》表明，南京的领导人从罗大纲那里早已得知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消息，罗大纲大概还与南京商量过军事接应上海的问题。清方有一件在十月十五日（即小刀会占上海后70天）收到的探报，称：“罗逆半月前赴金陵，三日前回镇江，……又该逆于仪征各码头置造皮篷小船六百只，有冲水营直下接连上海匪徒之信。”^②罗大纲原为天地会中人。他为上海事到南京十余天，有置造小船直冲清军水营沿水

① 黄光城等译：《麦华陀1854年6月访问天京文件辑录》，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14页。

② 丹徒县禀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423页。

路去接应上海的计划,表现了他对小刀会义军的积极性。但这件事并无下文。

次年三月,南京从罗大纲处得知上海义军请太平军往攻苏、常,他们愿为内应的建议,杨秀清去信要求他们考虑“何去何从”,而对此议本身则未置可否。

太平军从军事上接应、支援上海,的确存在困难。当时,在南京以东,太平天国的力量只及镇江,不可能越过常州、苏州去会合或支援上海。1853—1854年间太平军主力正分兵北伐、西征,南京、镇江的兵力并不充足。但是,当时在南京、镇江与太平军对抗的是向荣的江南大营,小刀会上海起义,向荣即从江南大营抽调3200名兵勇由他的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统率前往上海镇压^①,是上海的起义已减轻了南京的压力。在小刀会起义后50天时,江南大营“兵数不逾九千,勇数不逾三千,其中染病养伤者,尚有十之二三”,分兵四出,顿驻南京城下的,只3800余名^②。至于水面,向荣多次陈奏,认为清军水师微弱,“贼船往来,无术阻截”^③。在此情况下,太平军从陆上抽拨千数百名兵力,或从水路如罗大纲的计划,即或不能克复苏常,但冲入上海,会合、领导上海义军,在军事上不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说,即使军事支援有所不能,派得力干部前去指导统率,应有可能。如果说刘丽川的称臣表已送达南京,既然上海、镇江间可以有人来往,洪秀全派遣少数人去上海,满足刘丽川提出的“差官莅任暨颁赐眷黄”的要求,应是可以做到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太平天国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① 向荣奏稿卷4,《上海宝山等县失守由许乃钊带兵往剿折》,见《太平天国》第7册,218—220页。

② 向荣奏稿卷4,《遵筹攻守事宜远守不如近堵分攻不如合剿折》(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发),见《太平天国》第7册,228页。

③ 向荣奏稿卷4,《筹划上游师船片》(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发),见同上,196—197页。

所以,太平天国之未有实际的行动去领导、支持上海起义军,只从客观困难方面去证明,是不充分的。我认为,应该看到太平天国主观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对上海地位重要性的认识。1853年3月太平军克南京,建为首都,上海一夕数惊,时人预计太平军会东下上海,所以英美公使和传教士急于探询太平天国进取上海时对外侨的态度。但太平天国当时的决策是分兵北伐、西征而不顾上海。而1860年起,太平天国尽管面对西方国家的武力抗拒,仍一而再、再而三进取上海。在前期,上海在太平天国领导者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如后期那样重要。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对上海起义者成份素质的看法。上海小刀会是以福建帮、广东帮为主的天地会支派,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会党。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和后来几年,天地会活跃于南方各省,他们在宗教信仰上、行为习惯上与拜上帝会有很多区别。金田起义前夕,洪秀全曾对天地会发表评论说:

我虽从未加入三合会(按即天地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说法,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是很对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再说复明就不对了。无论如何,当我们恢复本国山河时,应该建立一个新朝。……三合会有一些恶行是我憎恶的;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起三十六誓,又须刀加于头,迫他向会献财。他们的真宗旨已变得很卑下不堪了。”^①

洪秀全以为自己得有上帝之真道,古来英雄豪杰都不值得一赞,天地会更是卑不足道。他命令,凡天地会人如不舍弃旧习而皈依真道,就予以收纳。起义初期,张钊、田芳等人即因此而脱离,罗大纲则相反,自愿遵守洪秀全的原则而留下^②。

上海义军既是小刀会众,对于他们来归,洪秀全一定也会提出“舍弃旧习、皈依真道”的要求。太平天国领袖们所了解到的这些要

① 洪仁玕述、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据原文对译文稍有修订。

② 据同上。

求被满足的程度,也一定会对太平天国采取何种行动发生影响。这是事理所必然。应该说,刘丽川等是知道这一点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在起义8个月后又接连发布上面已抄录的两篇告示,公开宣布上帝创造人类和崇拜上帝、不信邪教的态度。这是有所为而发,是刘丽川等为着争取太平天国的领导和支援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但这些告示,从太平天国的立场来看,必定并不满意,至少还存在着如上文所分析的那些大的差距。更何况上海小刀会起义者在行动上并未实行毁弃偶像^①。而这在太平天国正是皈依真道的重要标准之一。当时和后来都有些外国人报道,太平王要这些上海起义者悔改过失,批评他们不戒鸦片和烟草,曾派员调查批评他们的不道德习惯和恶劣嗜好。我们且不论这些报道是否实有其事,单从以上两篇告示来看,刘丽川尽管作了很大努力在信仰上去接近太平天国,但太平天国能满意于“依照明朝规制”和“洪门兄弟”等提法吗?能被洪秀全认为是已皈依了他的“真道”吗?1853—1854年间,洪秀全在南京发动了完全排斥儒学和古圣前贤的运动,在自己的文献中唯一表示出他们与明代联系的词句“有明失政”字样也被删去^②,称道“明朝规制”和“我明太祖洪武皇帝”的告示,决不可能成为太平天国接纳小刀会起义军的根据。

所以,我认为太平天国首脑对上海起义军持有保留的态度,这是太平天国并未积极领导、支持上海和双方事实上并未能联成一体的重要原因。

当时上海的《北华捷报》和其它出版物报道了刘丽川等的一些言论和涉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与太平天国间关系的一些见闻。它们被有的学者看作太平天国领导、接纳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证据。下面对这些证据略作分析。

① 起义首领在当年中秋和次年元旦都赴庙拈香。至次年春夏时,《北华捷报》报道,“直到最近为止,叛党同他们的同胞一样,喜欢崇拜偶像”,“他们对于庙里的偶像仍旧没有干涉”。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25页。

② 王庆成:《儒学在太平天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3期。

(1) 1853年9月8日起义当日,刘丽川访美国公使马沙利,向他“说明叛党与太平王有联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对外侨一定秋毫无犯。”

(2) 9月15日,刘丽川访各国领事,向他们说明“上海叛党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

(3) 10月16日,刘丽川致各国领事函称:“本帅已与太平天王约定时通音信,盖本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又称,起义时循美国领事之请放走吴健彰,“而吾南京太平天王闻之,对本帅此举倍加责难”。

(4) 12月7日,小刀会义军炮台上插有“一面黄旗,黄旗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太平天国’四个大字。”^①

这些报道表明,刘丽川在起义之始就宣布自己是太平天国的一部分;但决不能以之来证明他们之间事实上已存在这种关系。刘丽川上天王奏写于阴历八月,未署日期,但奏文中提到已克复青浦、嘉定、宝山、川沙、南汇等县,其中青浦克复最晚,时为八月十五日,即9月17日。所以刘丽川向天王称臣之奏不能早于9月18日。但上述四则报道中前二则述刘丽川对外国使、领语,都在9月18日前,此时刘丽川尚未上奏,何来与太平天国的一体关系?

第三则报道,事在刘丽川上奏后近一个月,又述及天王责难云云,似乎确有其事。其实,且不论他的奏章并未送达南京,即使送到了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就收到了天王的答书,以当时南京上海间交通的困难而论,就不能不加上一个问号。尤其是他的奏表丝毫未谈吴健彰之事,天王的答书何从就此进行责备?这分明是向美国表示他放走吴健彰这一人情的分量而加入的一个情节,批评美国人何以不领此情,不助义军而反而暗助清军。

刘丽川作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声明,表示是有原因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不仅是当时伟大的新兴力量,而且在上海的外国人中

^① 以上分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57、62、17、86页。

间拥有不少同情者，刘丽川认为宣布自己是太平天国的一部分有利于提高上海起义军的威信。有一本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上海史》的作者，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都不怀好感，但作者说，在小刀会起义时期，“许许多多外国教士完全相信洪秀全发动广大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号召的神圣意义，而各国领事官员和报章记者中间，也没有谁不受这种信念的影响”，他举出的例外只有美国公使马沙利和在宁波的传教士玛高温^①。刘丽川、陈阿林都认识不少外国人，他们必然了解在一个外国人颇有势力的县城，宣告自己是太平天国的一部分所可能产生的好处。如另一本《上海史》的作者所说，“他们知道外侨同情太平王，他们也在奉太平王以自尊”^②。

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最初领有附近州县数处，但不久失去，孤立于县城一隅。他们迫切希望太平天国的领导和支援；同时借重太平天国的名号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们甚至表示过愿成为基督徒以争取外国的同情^③。在这种情势下，尽管太平天国并未实际领导、支援他们，他们向外国人再三表示他们与太平王的密切关系，就是可以理解而不可轻信为事实了。上引的第四则报道——炮台上插有“太平天国”字样的旗帜，很可能也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表示。

有一位名叫施嘉士(John Scarth)的英国人曾在1854年底亲身进上海县城见刘丽川等人劝降。他的一些见闻似乎是太平天国与上海起义军已实际联为一体的证据。但这也需要审慎分析。施嘉士报告说，“他们希望加入南京的叛军，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的确毫无疑问。他又说，“我见过两封南京写给他们的信”，这也有可能，太平天国与上海的某些联系确是存在的，如罗大纲，如杨秀清给李闻风函。但施嘉士说，首领的大信封上有“太平王”字样，又说城内一些门窗上贴有禁止骚扰的布告，上面“盖着太平天国的印

① 兰宁、柯林著：《上海史》，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590页。

② 梅朋、法莱台著：《上海法租界史》，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610页。

③ 1854年5月22日英使包令给外相克拉兰登函，转据J. Y. Wong论及：“The Taiping's Distant Allies”。

章”^①，这必然是无稽之谈。太平天国的书信、告示都盖发信、发示人的官印，决不会盖“太平王”的印。而且太平天国既未“差官莅任”，刘丽川等也没有受封太平天国的职官，始终自称“太平天国征讨大元帅”、“左元帅”等非太平天国官制的名衔，因而决不可能由太平天国颁给上海义军官印。从现存的4件小刀会起义军告示原件或其照片来看，本文考释的两件未钤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左元帅陈”一篇关于典当让利的告示，《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据原件照片影印，我1984年5月在剑桥大学图书馆获见原件，钤篆文方印，高宽均约7.3厘米，虽印文未能全识，但从告示署“大明甲寅年五月初四日”，就可以知道绝不可能盖太平天国的印章，更不用说篆文方印与太平天国的官印形制迥异了。另一件“太平天国统理政教左元帅陈”关于缴毁清方免死票的告示，发于小刀会起义晚期，时为甲寅年十月十一日，从原件的影印本中可以看出也是篆文方印，必非太平天国所颁。

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不只是他们的不幸，而且也是太平天国的不幸。1860年李秀成东进上海，有“汉兵内应”是所依恃的条件之一，但内应力量的薄弱，比之六、七年前占领了上海县城池的小刀会义众，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李秀成兵未到，内应已被薛焕破获镇压下去。六、七年前，西方对太平天国颇有好感，当局标榜“中立”，并无对抗太平天国之计划，而1860年，英法在上海有地面武力，公开表示要以武力抗拒太平军进入上海。上海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浸假成为最大的通商口岸，关税收入丰盈。当1853年上海为起义力量占领以后，起义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希望得到太平天国的领导和支援，甚至在复灭前夕还有突围冲向镇江之议^②，其向往之忧不可谓不诚。但太平天国并未有实际的主动行动，其主观原因，如前文所述，当时对上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对

① John Scarth:《Twelve Years in China》(1860), 203, 195页。

② Scarth前引书, 218页。

上海起义军的思想、信仰有所保留,应是其主要者。从一般现代人的观念来看,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如能为我所用,又何必苛求宗教、习俗之差异,即或刘丽川等吸食鸦片,又有何妨?但在洪秀全看来,他手创的宗教政治伦理原则,是他的革命的基础,是“人”“妖”的界限,他的革命就是为了实现这些原则,因而对不符合原则者不予宽容。这样,太平天国就失去了一次机会,至少是失去了一次派得力大员去领导他们以试图在上海站住脚跟的机会。

(责任编辑:谢维)

(作者王庆成,192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